

西陲守孤城

(一九九二年十月初刊·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重刊)

謙謙君子賀國光(一)

●周培楨(旅美作家)

畢生事功大轉捩點

賀國光字元靖，湖北蒲圻趙李橋人，生於前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十月廿四日，幼讀家塾，年十歲在書院就讀詩經，每日熟誦三千字，默寫三百字。十四歲讀畢四書五經，且能背誦旁及經史詩文多所涉獵，奠定了渾厚的國學根基，十六歲入上海廣方言館肄業，(其先叔賀良樸為方言館監督)與革命先烈鄒容(慰旦)、張君勱、張嘉璈、陳大齊(百年)等人為少年同學。十九歲隨侍父親賀鏡泉宦遊四川，其堂兄賀倫璽正在成綿兵備道任官，賀氏在道署學習官規數月，深以流於鄙陋且有寄人籬下之感，毅然棄官習武，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校肄業三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升至高級班深造半年，留校任排長，以後五年之間皆在川軍中新軍歷任隊官軍職，嗣參與辛亥四川起義之役。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由四川返回湖北故鄉，任湖北陸軍第四旅第七團營附，民國二年冬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民國五年十二月畢業，分發湖北軍中任下級軍官。自民國六年至十四年八年之間，歷任湖北陸軍第二旅

營團長及第一師旅長，復轉升為陸軍第五師師長，仍駐湖北，歷時九年，武漢下游，長江兩岸，粵漢鐵路鄂境西側，與漢沔地區駐防迤邐，行軍所至，紀律良好人民受到保護。民國十年賀國光任團長時，他的直屬旅長為寇英傑，當湘鄂戰役直軍(吳佩孚)援鄂暗聯湘軍以倒鄂督王占元，寇英傑旅長抱持觀望態度，逗留武漢前方，軍心動搖，另一團官佐且多自行逃散，他在兵慌馬亂之餘，當機立斷，想盡各種方法，收容該旅部隊，並剴切告誡官兵，此時前後皆敵，如果走散，必然被人宰割，死路一條，不若集結力量，尚有可為，因此兩團官兵陸續全部集合整訓，加上其他無隊可歸而未附敵者約五百餘人，遂成為人員裝備齊全之一大師旅，賀國光率領繞道金牛退至鄂東，後果為鄂軍當道借重，迭獲升遷，由鄂率部移駐河南，升為陸軍十五軍軍長兼開封警備司令，全軍主力駐防豫南，適國民革命軍於民國十五年秋會師武漢，賀國光與靳雲鵬將軍(原係直軍軍頭吳佩孚屬下主將)同時響應，策動北方部隊參加革命行列，使武漢局勢趨於穩定。旋被任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時為民國十五年

十一月，乃北伐進展中成敗之關鍵時刻，亦為他畢生事功之重大轉捩點。

交出兵權赴京參贊

民國十六年秋賀國光由河南帶領部隊到湖北整理，決心將部隊交出，並聲言以後絕對不再帶兵，旋任軍委會陸軍處長兼武漢衛戍副司令，但因寧漢分裂國民政府適時奠都南京，乃赴京任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受知何應欽(敬之)上將推薦於蔣總司令介石，民國十七年隨軍第二次北伐，曾上建議書，對軍事、敵情、地形、民俗、分析詳盡確實，對北伐進軍，頗有助益。北伐軍事將告結束，北伐全軍總司令部決定設立「點驗編遣委員會」，着手整理收編事宜，賀國光奉派為編練委員，某日蔣介石總司令召集各委員聽取收編隊伍之點驗結果報告，每一委員都是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不得要領，蔣總司令頗感不耐，輪到他報告時僅只遞呈報表一份並未發言，蔣介石總司令察閱內容詳分「部隊番號、名稱」「官兵人數」「武器種類數量」等欄，記載分明，簡單扼要，一目瞭然，立時大加讚許，宣佈散會，限令其

他點驗委員均照賀國光表式呈報，事後並複印五份分發有關部門參考，編入陸軍典範教材施行，賀氏每與筆者追憶敘及此事時，嘗引為得意之作。北伐勝利，全國統一，國民政府成立，賀國光曾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旋因中央軍事機關改組，調任訓練總監部步兵監，對軍事制度之策劃改善，與軍事教育之整理，建樹良多。民國十八年三月隨蔣介石總司令西征，任參謀長，四月初抵武漢，調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參謀長，民國十九年十二月，朱德、毛澤東帶領共軍盤據贛南，中央軍進行圍剿，賀國光參謀長在蔣總司令戎幕工作。民國廿二年二月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參謀長賀國光奉命由南京前往江西，主持剿共軍事，二月十日抵南昌，改組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佈署第二次圍剿。直到民國廿一年三月六日，蔣介石委員長北上後，江西剿共軍事，乃交由賀國光與陳誠負責。

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事發生，三月初因「國際聯盟」斡旋，與日軍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中央為貫徹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繼續進軍剿共，五月初蔣介石委員長親臨南昌，統一指揮剿共軍事，賀國光任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掌管軍事作戰參謀業務，運籌帷幄至洽機宜，深得蔣委員長之信賴，某次蔣介石親筆手諭指調閩邊某師增援贛南剿共軍事，將該師的番號誤寫成遠駐河北的某師，承辦參謀擬妥電稿呈核，賀國光知是筆誤，為免貽誤戎機。立即改正蔣介石手令。事後面報蔣委員長，深受推重。嗣後凡前方將領來南昌謁見蔣介石時，蔣必諄諄囑諭「以

後應多與賀參謀長連繫請益」。自是以後他的官舍總是將星雲集，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當時戴笠（雨農）之特務勢力正是萌芽初期，戴笠的工作方針是三分對外七分對內，但特別告誡所屬，對賀國光寓所附近周圍環境，不得稍有監視侵擾，賀國光公館儼然成為「租界」緩衝地區。

碉堡戰術對上游擊

軍委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成立後，蔣委員長策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剿共方略，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中旬開始第一次圍剿起，至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完成第五次圍剿止，前後四年，因被中共的游擊戰術所困擾，歷次圍剿無功，賀國光有鑒於針對中共的游擊戰術：「你駐我擾，你進我跑，中途腰擊，伺機截援，進則人海猛攻，以大吃小，守則不打硬仗，見機就跑」，如果依照普通戰術進行，稍一不慎，不敗於行軍，即敗於防守，幾經研究特建議採用「碉堡戰術」付諸實施，卒收大效。所謂「碉堡戰術」即以拙制巧，穩紮穩打，逐步前進，逐步圍剿，使包圍圈逐漸縮小，然後聚殲，其構築原則，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堅，務使縱橫連貫，目力火力皆能交叉，是為最有效之「反游擊戰術」。第五次圍剿，奮戰經年順利完成，迫使中共放棄「蘇區」向西移轉，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國人以「賀碉堡」相稱，聞名遐邇，日本侵華戰爭時，亦曾採用此項戰術。

在蔣委員長集中力量進行圍剿時期，四川方面一直處於割據紛爭的局面，與中央政府貌合神

離，陽奉陰違，迨至中共軍主力彭德懷、徐向前、蕭克、賀龍相繼向西流竄會合，中共軍頭以四川地處西陲江山險阻，沃野千里，物產豐富，人口近五千萬，他們計畫占據四川為發展基地，時任四川剿共總司令劉湘感到事態嚴重，決非他個人所握軍力能够抵禦中共大軍進攻。乃飛往南京晉謁蔣委員長請示方略，中央為適應當時情勢需要，決定設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參謀團，策劃指揮川康滇黔各省剿共軍事，並藉以督導西南軍政之改進（實為中央勢力進入四川之先導）特委賀國光為參謀團主任，參謀團在南昌成立時，他為避免組織龐大，人員過多，容易引起川軍誤會，在編制上盡量縮小，自主任以下，文武官佐初僅四十一人，嗣在重慶因業務需要增加十餘人。

豎立威信人稱賀婆

賀國光於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廿九日由南昌行營兼程入川，民國廿四年元月十四日參謀團到達重慶，此行係由宜昌換乘四川民生公司輪船溯江而上，當時四川民衆因感傷局勢緊急，又久為軍閥割據所苦，仰望中央之心至為殷切。故參謀團一入川境，自巫山經奉節、雲陽、萬縣、中縣、豐都、涪陵、長壽以至重慶，每過一縣，江岸皆佇立民衆鳴放鞭炮歡迎。抵重慶時歡迎者更是萬人空巷，翌日在各界歡迎會上賀國光掬誠宣告中央決心剿共安川策略，全場欣然感動，事經報載，皆大歡喜，人心賴以安定。

參謀團入川，中央宣布三大政令：一、統一

(一) 謙謙君子賀國光

軍事指揮，軍餉直接由中央發放；二、撤銷防區制；三、官長不許離營。賀國光又本「修己以安人」古訓，針對當時環境，規定六項守則：「①操守要廉潔；②處事要公誠；③態度要謙和；④言語要謹慎；⑤行為要檢點；⑥工作要努力。」與同仁相約共勉，身體力行，藉此推行中央政令，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當時有駐防貴州的軍長侯之粗逗留重慶未返，違犯中央官長不許離營命令，立被撤職扣押。自此凡百軍政措施，無論與任何軍事首長聯繫、協調，皆必言聽計從，川中上下人等咸以賀國光誠信孚人，莫不信賴有加，暱稱他為「賀婆婆」。

穩固中央地方關係

川軍將領劉湘（甫澄）掌握部隊較多，其數約佔全川兵力五分之三，其幕府中亦不乏有識之士，故安川必先安劉，賀國光早在川與劉係速成同窗，友誼篤厚，相見以誠，相信尤深，兩人一本至誠，和衷共濟，公誼私情，融洽無間，但因防區制之撤銷，軍隊走向國家化，軍中將領彼此間內部糾紛，公私關係複雜，個人利害交錯稍有不慎即生變亂。尤以中央勢力相繼進入，人事佈置，問題漸多，如當時成都軍分校主任李明灝，別働總隊長康澤（兆民）乃是黃埔軍校少壯派主幹人物，康澤為初期特務勢力之領導人（在戴笠之先）其部屬散佈尤廣，此輩人士豈能皆聽命於賀國光。

劉曾向他訴怨的表示：「康澤的部屬在外所喊口號：擁護中央，服從領袖，但他後面的口號

則是『打倒劉湘』，叫我如何忍受？」因此隨時發生誤會與磨擦，日甚一日，再加以一部份不識大體的政客者流，從事顛倒是非，或推波助瀾，或挑撥離間，或造謠生事，幾無寧日，隨時可以釀成事端。賀國光深感事態嚴重，必將影響大局，特電呈蔣委員長，將劉湘所作所為，列舉事實，證明全係防衛性質，絕非準備犯上作亂，如能循循善誘定可為善，並願以個人生命作擔保，如所陳不實有誤國事，屆時請以貽誤戎機交軍法治罪。

蔣委員長察及川局隱憂與賀國光處事不偏不激，守正不阿，接納進言，特自南京親頒電令文曰：「中央人員在川氣餒萬丈，令人難堪，種種不法行為，殊堪痛恨，嗣後責成賀主任全權負責處理，無論為官為兵，為文為武，凡有不法者，一體先行舉辦，然後具報。」

賀國光將此電轉送劉湘甫澄一閱，並即將電文照印數百份，分知其所屬文武官員，彼等上下均受感動，由是中央與地方關係趨於穩定和諧安寧。

參謀團駐川將及二年，因重慶行營於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成立而先結束，顧祝同（墨三）任行營主任，賀國光任參謀長兼第一廳廳長，不意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顧祝同趕赴中樞策劃討伐事宜，賀國光坐鎮重慶，川軍中仍有少數失意份子要倒蔣獨立，時重慶警備司令李根固（劍鳴）亦係賀國光速成同學，師長許紹宗乃劉湘之心腹大將，中共軍則有卅六軍（軍長關澤元）、憲兵第三團（團長袁家佩）等部隊駐防近郊，一時為

謠言所惑，雙方互有猜疑，竟在重慶附近坪壩關一帶構築工事備戰，賀國光聞訊以事態嚴重立即邀同李根固司令、周渾元軍長等一同親至陣地，督令雙方劃除工事曉以大義，共同聽候中央處置，遂使彼此疑團頓釋，化干戈為玉帛，未幾蔣介石委員長獲釋回京，舉國欣騰，四川與中央關係未出現絲毫之不快之痕跡。

培植地方忠貞幹部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八月間成都舉行市民大會十萬人參加，決議請中央發動全民抗戰。劉湘奉召赴京謁蔣，與白崇禧、閻錫山、余漢謀、顧祝同、何成濬、何健等晤談共商國是，旋即重慶召開川康整軍會議；中央派軍政部長何應欽為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川康綏靖主任劉湘為副主任委員，賀國光為委員兼秘書長，會議為期三日，進行極稱順利。有關整軍之實施辦法，及前此所有問題，均商有結果圓滿解決，促成政治中央化，軍隊國家化，以奠定安川抗日之基礎，實為近代史上最具價值之關鍵會議。同時蔣委員長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不另設大本營，自八、九月起，川軍遂分路出川與日軍奮戰於各戰場。（民國廿六年八月卅日川康綏靖會議決議：出川抗日部隊限於九月五日以前開拔。）

抗日戰爭初期，淞滬、南京相繼不守，政府遷往武漢，堅持近年，情勢未見好轉，乃決定放棄武漢，西遷重慶，民國廿七年十月廿四日國民

政府遷都重慶，湖北主席張羣接長重慶行營主任，（原主任顧祝同調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賀國光專任副主任，參謀長兼職由劉湘之首席幕僚傅常（真吾）接充，因劉在武昌軍次病故，此項委任實為安撫作用。民國廿八年初重慶行營結束，中央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推蔣介石委員長行轅，賀國光受命任成都行轅主任，二月十三日開始辦公，轅址在成都祠堂街舊將軍衙門。

五月三、四兩日，日軍突以四十五架飛機兩度轟炸重慶，市內發生大火，市民死亡四千四百餘人，受傷三千一百餘人，房屋被炸燬一千二百餘棟，災情慘重，人心惶惶社會極度不安，賀國光復受命兼程前往重慶接任市長兼防空司令各職，因為時值中央政府遷渝甫定，地方情形不甚熟悉，於是整個大後方，成渝兩地軍政大權集於賀國光一身，擁掌特任官以上官印達六方之多，真所謂炙手可熱之人物。稍後重慶情勢穩定，成都政局又生暗潮，賀國光返回成都坐鎮（重慶市長由吳國楨接任）蔣介石委員長於十月三日由重慶飛成都處理四川政務，在中央軍校召集四川將領會議，（賀以成都行轅主任身分列席）蔣介石以現任四川主席王鐵緒（治易）將調前方軍職，以何人繼任主席為宜，徵詢大家意見，且對與會之鄧錫侯（晉康）、劉文輝（自乾）、潘文華（仲三）、王陵基（方舟）等個別提名，彼等均皆謙辭不受，蔣介石最後宣佈：「既然各位謙讓不就，省政一日不可無人主持，蓉、渝相距咫尺，暫由本人以委員長身份兼省主席，派行轅主任賀國光兼秘書長代行主席職權。」隨即散會，事實上當時與會者每個人都想當主席，聆此結論啼笑皆非，莫可如何散會而去。翌日蔣介石偕賀國光同往省府接任兼職，賀國光僅以行轅第二處處長孟廣澎（簡濤）隨任省府主任秘書職，（孟氏在湖北省政府任民政廳長甚久，饒富地方行政經驗）。賀國光代行主理川政為時一年，以川省承襲過去割據積習甚深，非樹立良好制度，無以改弦更張尋求治理，乃制定征兵征糧辦法，飭屬遵行，而當時川省秩序尚未大定，推行此項新政，貫徹頗為不易。賀國光毅然行之，嚴定規章，循循善導，卒能順利完成。嗣以地方各級政府人事相當複雜，舉凡法令推行，層層窒礙殊多，復確立地方人事制度，選拔優秀青年，以「甄審」「訓練」「任用」「考核」四個階段，培植地方忠貞幹部，期使各縣市地方行政一洗過去積習，而臻合理合法之境域。直至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中央派張羣（岳軍）接任成都行轅主任兼理四川省主席，賀國光調任憲兵司令仍兼重慶衛戍副總司令，當其離開成都之日，成都各界舉行歡送會，鄧錫侯（川康綏靖主任）致詞謂：「賀先生事上以忠，待人以誠，處事以勤」國民黨省黨部主委黃季陸謂：「暫時失去了一位和平、忠實、負責、寬大、誠懇的朋友，非常難受。」皆係由衷之言。而其啓程之際，由金河街寓所至飛機場約有卅華里，沿途鞭炮之聲不絕於耳，成都報紙則載：「民國以來，成都軍政首長離去，不是罵走，就是槍炮趕走，唯有賀國光主任是民衆放鞭炮把他歡送走」，雖多溢美之詞，而川中父老兄弟對他的愛戴之情，實充

分表露無遺。

安鎮後方憲兵司令

賀國光於民國卅年一月接任憲兵司令，當時憲兵約有廿四個團，分佈全國各要地與各戰區，負責維持軍風紀及地方治安，分佈地區既廣大，擔任勤務又複雜，指揮因應極為不易，憲兵官佐自副司令張鎮（真夫）以下皆黃埔軍校各期畢業生，他接任之時，僅帶一侍從衛士，連一個副官都未帶進，尤且辦公室秘書缺額早已補滿，憲兵司令部顯然有消極抗拒行動，賀國光毫不介意，處之泰然。（二個月後筆者始由成都行轅機要課調重慶在憲兵學校掛名少校教官派在司令辦公室工作，至此賀氏之「光桿司令」至少有一人接聽電話供他呼喚了。）他每星期要赴大本營（軍事委員會）參加軍事會報，與蔣介石委員長常有見面機會，某日蔣向賀國光垂詢憲兵部隊狀況，他坦然答陳：「憲兵的經理、人事制度均極上軌道，只是升至團長即無出路，故人事升遷發生瓶頸現象。」蔣介石立即諭示：「速選選資深憲兵團長保舉，將以外升師長任用。」第一批保舉資深團長獲圈選外升師長者係郭文燦（字龍飛，黃埔五期，時任憲兵司令部總務處少將處長）稍後又有憲三團團長袁家佩（黃埔三期）發表師管區司令，自是以後憲兵中高中級官員莫不對其愛護部屬親若子弟感激佩仰之至！迨賀國光調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時，蔣介石有另派俞濟時（時任侍衛長）接長憲兵司令，他聞訊謁蔣力保時任副司令張鎮接任司令邀准，事後張氏對賀國光提挈之情，

恩同再造，感德無涯。

改善山城防空設施

民國三十年五月初，日軍發動空軍猛烈空襲重慶，施行「疲勞轟炸」策略，五月九日八十架、十日五十四架、十三日六十三架，分批輪流來襲，幾乎一星期都在警報聲中渡過，難得在部內吃一頓正餐，（均在防空洞只以炒米糖、開水餛頭果腹）迨至六月五日日機又繼續轟炸重慶，遂至發生大隧道慘案，層峯震怒，將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防空司令劉峙（經扶）撤職留任，改派賀國光兼防空司令，（他曾於民國廿八年五三、五四、日軍首次轟炸重慶時由成都行轅主任調兼重慶防空司令處理善後）是時擔任防空情報所所長之熊覺（椿齡）將軍現居臺北，筆者為撰寫此文特馳函熊君徵詢當時經過，得其復函如后：

「前略，弟在渝資料已因歷次搬遷蕩然無存，承詢各節，現僅憑思索得來，提供如次：

一、賀國光第一次兼任防空司令時，弟適在湖北恩施，未悉其詳，只知參謀長為白鑑宇……

二、第二次兼任時，係因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後，當時人心惶惑，民怨沸騰，大公報社論有「借人頭平民憤」之議，層峯極為震怒，除由中央組織人民法庭，指派吳鐵城為審判長進行審判外，並將衛戍總司令劉峙上將免職（筆者按係革職留任）原兼防空司令改派賀國光兼任。

三、賀國光為人忠厚負責，懷抱謙沖，思維縝密，事必躬親，與地方人脈良好，深得川人擁

戴，中央依畀，且當時中央機關部隊與地方武力間時多齟齬，非賀國光無以取得各方信賴，亦無法居間調停，尤其防空司令與空軍關係密切，此一兼職除賀國光外不作第二人想。

四、大隧道慘案，發生於民國卅年六月五日，當天日機疲勞轟炸，警報時間較長，躲至防空洞內的人，因通風不良，多出來換換空氣，忽然間日機掩至，發出第二次緊急警報在洞外的人羣爭先多搶進隧道，驚惶失措，互相擁擠洞口狹小，致前者被壓倒地，肢體折斷，後者仍不顧一切，拼命內衝，因此擁塞洞口，堵得水洩不通，積屍累累，洞內則發生窒息，致死傷滿坑滿谷，據官方統計踐踏窒息而死者約八千餘人，實數絕不止此。

五、掛一個紅球是表示「預行警報」在警報聲中，如敵機離開，後續來襲即改換一紅球，以便避難民衆有喘息的機會。（此節所述稍欠明確，與當時情形不符，據筆者記憶所及，原來防空警報採用鳴笛，由於人多車多，常因界限不清而誤事，上次賀國光兼任重慶市長及防空司令即着手改進防空警報方法在高山或市區高建築物以掛球為警報，具體的作法是：掛一個紅球為預行警報，表示發現敵機來襲，市民要提高警覺，掛兩個紅球為空襲警報表示敵機將要進入市區上空，市民須盡快進入防空洞，兩個紅球同時降落為緊急警報，表示敵機已進入市區上空，市民務必隱避。）

六、賀國光第二次就任後，積極改善防空洞通風裝置，加強中央尤其是防空與空軍之聯繫，

增強防情通訊有無線電之裝置，充實防護防毒之組織與裝備訓練，重慶的防空完善與堅強得以著稱於世。就弟親身體驗，他人兼防空司令均未如此，其認真負責及臨事不苟之精神及其平易近人，仁民愛物之懷抱，實是為後人楷模，迄今思之景仰不已！」

置整體安危於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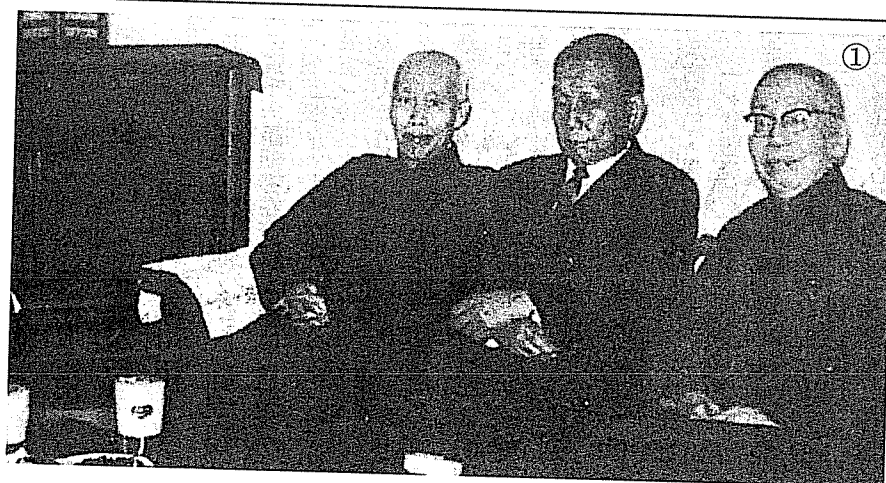
賀國光第二次兼任防空司令職，工作重心全部集中在防空司令部，下午六時以後才到憲兵司令部處理公務，常至晚上八、九時始克回寓，宵旰宣勤，置上下整體安危於一身。賀國光在其「八自述」中亦有簡略記述：「重慶大隧道在敵機空襲時發生窒息慘案，余又奉命兼任防空司令，針對慘案發生原因，立即增加洞口通風及照明設備，改進洞內及洞口交通，加強維持避難秩序，整理甬道，敵機再度實施疲勞轟炸七晝夜連續不停，即每隔二小時至少有廿七架一批飛來轟炸，余則恃情報準確，在其轟炸之後即發出休息信號（長形黃球）俾市民得以出洞休息，並利用此一個半小時內，分送茶水與食物表示慰問，如離家較近者，尚可回家料理飲食，但發出信號時，因有膽小者不敢出洞，亦間或酌情發給解除警報，使其出洞換取新鮮空氣，少時再發緊急警報，因此雖經七晝夜之疲勞，亦能忍受而不甚困頓。又在敵機每次轟炸之後，我防護機隊立即出動，從事救火救護，迅將秩序恢復，而重要工廠之設在防空洞內者，仍照常工作，故當時雖受敵機疲勞轟炸，民心士氣毫未受其影響，而物力之損失

亦微，反之敵機與師動衆遠來之損失較我爲大，故對我空襲亦因之逐漸減少矣。

民國卅三年二月賀國光奉調爲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十六年前他第一次擔任此職務，時乃北伐後奠都南京之臨時機構今則爲戰時大本營，爲參謀總長以次之幕僚首長，自不可同日而語，

此時抗戰進入末期階段，敵人已成強弩之末，五月下旬湘北日軍分三路南犯，發動猛烈攻勢，我軍鏖戰數月堅守衡陽，不意八月四日衡陽撤守後，九月柳桂會戰開始，至五月下旬梧州、福州、桂林相繼淪陷，政府宣告放棄柳州，而日軍主力沿黔桂路進犯竟突破入貴州省境佔據獨山。此時

重慶政府極感震撼，爲堅持長期抗戰策略，一度有遷都西昌之議，幸適時美軍在太平洋戰區開始反攻，美機轟炸日本東京戰略及工業目標，隨着在菲律賓呂宋等處登陸，敵軍未敢繼續孤軍深入，我方不多時即收復獨山，緬境我遠征軍收復臘戌，使局勢趨於穩定。」



元靖吾兄 主席
茲派經國來甯慰
勞并面達一切並
予詳談爲荷順頌
政祺
中正 賀國光 楊森 劉航琛 合影

① 右起：賀國光、楊森、劉航琛合影。

② 民國卅九年一月廿五日蔣中正總統親筆致函慰勞賀國光苦守西陲孤城——西昌，由蔣經國親往西昌面交賀氏。